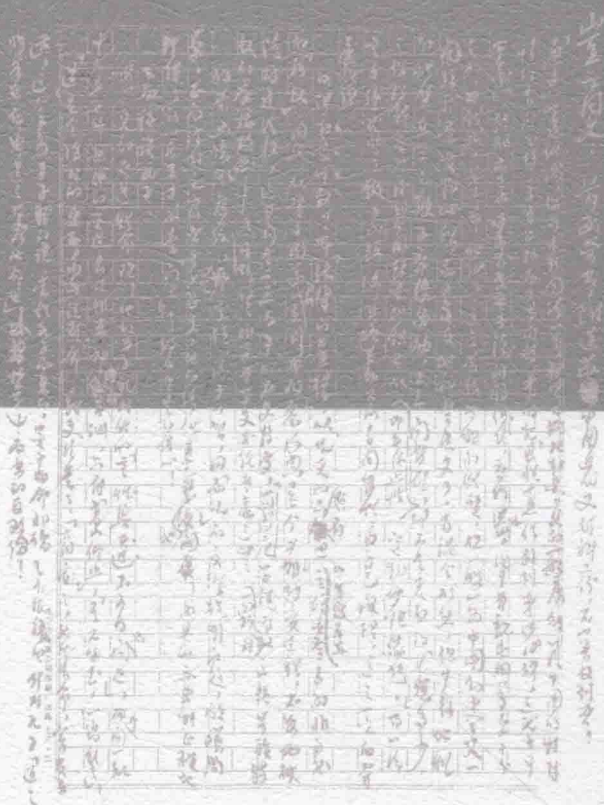




侯外庐著作 与思想研究

【第十四卷】



◎ 主编 张岂之

長 春 出 版 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

主 编 张岂之

第 十 四 卷

长 春 出 版 社

国 家 一 级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远言之，我爱慕王船山六经责开生面的气魄，仰慕马克思达到的科学高峰；近言之，自认最能理解鲁迅先生为民族前途，交织着忧愤和信念的、深沉而激越的、锲而不舍的“韧”的战斗。大半生来，在我追求、研究的不平坦历程中，鞭策力是共产主义拯救中国的理想，但是具体实践中，也并非时时都靠宏大口号支撑。坦白说，相当多的时候，我的信条几乎只有一个字，那便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那个伟大的字——“韧”。

——侯外庐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编委会

顾 问 何兆武 李学勤

主 编 张岂之

副 主 编 方光华 郑晓辉 张茂泽

执行副主编 谢阳举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光华	兰梁斌	刘文瑞	刘固盛	许苏民
牟 坚	孙振波	杜运辉	李友广	李江辉
李春龙	宋玉波	张中良	张岂之	张茂泽
张海燕	陈战峰	郑 熊	郑晓辉	赵明因
胡 新	侯且岸	宫长为	袁志伟	夏绍熙
龚 杰	梁严斌	程秀梅	谢阳举	路传颂

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上二）

侯外庐 主 编

侯外庐 赵纪彬 杜国庠 邱汉生 执 笔
白寿彝 杨荣国 杨向奎 诸 青

第十四卷说明

《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是由侯外庐主编，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以及诸青执笔，对隋唐至明末这一时期的思想历程展开系统梳理和考察。

《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近百万字，初次问世时，人民出版社将该书分为上、下两册，分别于1959年12月、1960年4月出版，并于2011年8月改为简体字本重新出版。

此次整理出版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为底本，由郑熊负责，整理工作具体如下：

一、出于篇幅均匀考虑，本次出版将原书上下册拆分为四卷（上一、上二；下一、下二），统一改为简体字出版。

二、通篇校对文字，对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字，在不影响今人阅读的前提下，未做改动，以保持原有的语言特色与行文风格。

三、对原书中出现的旧译名，一律改为现行通用规范译名。

四、核对引文，完善引文的出处，并对引文格式进行规范和统一。

五、统一规范参考文献的著录方式，对出版地、出版时间遗漏者酌情进行补充。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编委会

2015年10月

第五章

刘知几的进步的史学思想

第一节

刘知几史学的批判精神和对优良传统的发扬

刘知几，字子玄，彭城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卒于玄宗开元九年（721）。他是唐代的大史学家、大著作家。他自著书，有《刘氏家乘》十五卷、《刘氏谱考》三卷、《史通》二十卷、《睿宗实录》十卷、《刘子玄集》三十卷；和别人合修的书有《三教珠英》一千三百一十三卷、《姓族系录》二百卷、《唐书》八十卷、《高宗实录》二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则天皇后实录》三十卷。《史通》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唯一流传至今的著作，其中也有三篇佚失了，有一篇的原来面貌失真了。

刘知几在六十年的生平中，学史治史的生活差不多要占五十年。在儿童时期，他已对历史有很大的兴趣。二十岁登进士第以后，任获嘉县主簿，有不少时间读史。四十二岁以后，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不久即迁左史。四十四岁时，曾因拜凤阁舍人，暂停史职，但第二年就又除著作郎，仍兼修国史。四十八岁时，离史馆，但不久仍参加修史的工作。此后，他大概一直到六十一岁，官阶虽有迁转，一直都兼着史职。《史通》写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这时刘知几年五十岁。此后，《史通》仍有修改。

刘知几《自叙》说：

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

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曄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史通》卷十）

刘知几的这些话，说的是他三十岁以前的情况，但却概括了他一生治学的路数。他读《左氏传》，并不要“精此一经”，而是“见其事”，以“广异闻”。他读一代之史，要兼读数家，要钻研杂记小书中的异说。他能“触类而观，不假师训”；他“喜谈名理”，“得之襟腑”；他“轻议前哲”，并不拘于流俗之论，“凡有异同，蓄诸方寸”。他这种路数的发展，使他倾向于一种错综经纬、上下古今之学，既不专主一家之说，

也不作正统异端之分，其特点即在于虽年轻学浅，而敢想敢说，不为传统所惑，不为权威所拘。

刘知几的《史通》，是贯穿他治学精神的著作。《自叙》说：

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然自淮南已后，作者无绝，必商榷而言，则其流又众。

盖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书，是非多谬。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大道。故扬雄《法言》生焉。

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

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劭《风俗通》生焉。

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

夫开国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处。虽贤愚壤隔，善恶区分，苟时无品藻，则理难铨综。故陆景《典语》生焉。

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揆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以纳诸胸中，曾不慙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史通》卷十《自叙》）

《史通》的“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在形式上近似于《淮南子》的“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但《史通》的与夺、褒贬、鉴诫、讽刺，在内容上和精神上，吸取了扬雄《法言》的传统，以反对诡言异辞；继承了王充《论衡》的观点，以攻击欺惑抵牾；重视应劭《风俗通》的方法，以化除拘忌；并吸收了应劭的辨识人物兼偏长短、陆景的品藻贤愚善恶、刘勰的评论古今文章等特点。总的来说，《史通》的撰作，在于“以史为主”，而阐明治史的通识，这就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具有哲学的意义。《鉴识》篇说：“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史通》卷七《鉴识》）。通识是《史通》全书的主题。刘知几在这里没有说出他和《史记》的关系。但他对于《史记》，童年时就学习过，对于司马迁“拾遗补艺（六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精神，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他在《六家》篇说：“《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史通》卷一《六家》）。在《二体》篇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史通》卷一《二体》）。这都是从“通”的方面对《史记》的推许。尽管在别的方面刘知几对《史记》颇有不同的意见，但在“通”的这一点上对《史记》是赞美的。《史通·序》说：“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已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这就不只是一个名称的问题，而是刘知几以司马迁之得“通几”（相当于哲学）之学高人一筹，并隐然以当代司马迁自居了。

这里应该指出，刘知几在著作生涯中和当时的现实是有矛盾的。他之所以写《史通》，是出于不得已，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他之隐然以当代司马迁自居，也还只是一种谦逊的表示，而并不满足于做当代的司马迁。《自叙》说：

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论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记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中宗）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齬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快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歿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卷十《自叙》）

这就说出，刘知几没有孔子之名而要行孔子之事；同时，又以无孔子之名而怕行孔子之事。这是刘知几的真正愿望，也是他的严重顾虑。他所要求的“通”，本来是要删定司马迁以下的史书，上继孔子，成不刊之典，但因了官职这一种束缚以及和官僚们的矛盾，却又不能不退而以写出《史通》为限，而把他的志愿局限于对古今史书的评论上。这是刘知几的矛盾，同时也是社会矛盾在刘知几思想上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是复杂的：一方面是豪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社会斗争，通过学术上的折光，反映为刘知几以博雅高才对于流俗之人的指摘态度；另一方面是进步思想与封建主义的正宗虚构的专断之间的文化斗争，反映为刘

知几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官僚机构史局监修的抗议精神。由前者而论，是品级性地主的传统意识对历史估价的偏见；由后者而论，是中国思想史上优良传统的发扬。这两者的矛盾恰巧集中于刘知几一身，而刘知几的学术活动却以积极性为主要方面。

刘知几出身名门，是汉代楚孝王器的曾孙居巢侯般之后。他作刘氏家乘及谱考，考定刘氏先世，希望能得居巢的封邑，后来果然被封为“居巢县子”。他和柳冲、徐坚等所修《氏族系录》，是唐代重要的氏族书。他在《书志》篇和《杂述》篇中对于古老的氏族怀有颇深的感情。他对于氏族谱的真伪、不同氏族的盛衰，虽都给予了注意，但对于氏族的重视却是前后一贯的。帝王苗裔、公侯子孙、高门贵族，以及郡正州曹的世家，都被认为是《氏族志》的好材料；而对这类材料的记录是被认为“品藻士庶”的有用的东西。辨明氏族谱的真伪和不同氏族的盛衰，也正是为了把氏族史搞得更正确一些，以防所谓“伪”“冒”。

刘知几的士族门第的偏见是很显著的。《史通》卷十《辨职》篇说：

大抵监史为难，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马迁，精懃不懈若扬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载言记事，藉为模楷，搦管操觚，归其仪的，斯则可矣。但今之从政则不然，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

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遂使当官效用，江左以不乐为谣；拜职辨名，洛中以不闲为说。言之可为大噱，可为长叹也！（《史通》卷十《辨职》）

这些话当然也反映了史馆中的恩幸贵臣的以势利见升，以及他们在学术上的无知，但更根本地还是反映了史局职务中士族和庶族的矛盾。刘知几在这里所痛心的，不仅仅是官僚机构的用非其才，而还在于“恩幸

贵臣，凡庸贱品”，以“势利”和“干祈”而取得高位，从而“督彼群才”。在《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篇中更指斥“近代趋竞之士”所以“尤喜居于史职”，为的是“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以及可以“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刘知几虽然以当代司马迁自居，以继承孔子为志，但又以《史通》和《白虎通》比拟（见《史通·序》），这在一定意义上就反映出一种隐约的士族的偏见。另一方面，刘知几确也暴露出当时封建主义的官僚组织之束缚，在那里不问士庶，以势利和干祈为进身之阶，从而窒息了学术的研究。

刘知几的这种议论和他反对史馆监修是有联系的。因为当时监修人员以及史局的其他人员固然有不少是出身于庶族的，但他反对监修，更主要的是在这种制度对于修史工作的有害而无利。约在景龙二年（708）或其以后不久（见《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刘知几致书国史监修官萧至忠等，指出官僚机构式的史馆的五不可。其中第一、第三、第四有这样的话：

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李法）讥其不实，公理（仲长统）以为可焚，张（衡）、蔡（邕）二子纠之于当代，傅（玄）、范（曄）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悦）、袁（宏），家自称为政、骏（刘向、刘歆）。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

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齟舌。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成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劭直书，见讪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稟监修，杨令公（杨再思）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宗楚客）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其不可四也。（《史通》卷二十《忤时》）

这都指出封建官僚机构的史官监修远不及个人著作之能无所顾虑，自成一家之言。《辨职》篇更明白提出来一家独创之学是古代的优良传统：

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廊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岂与夫冠猴献状，评议其得失者哉？（《史通》卷十《辨职》）

在这里，刘知几的批判确对于“官馆监修”的封建统治，指出了一些危害学术发展的实质。

《史通》的“通识”，是刘知几一家独断之学的精神所在。如他说，一家独断之学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而对治史的通识的要求，实际上也同样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自“疏通知远”的《书》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以至于《史通·自叙》所说《论衡》《风俗通》《文心雕龙》等书，无一不在治学精神上从“通”字上下功夫。但刘知几独断之学有他的特点：其一是史才论，其二是直笔论。从史学方法上说，史才论和直笔论属于历史编纂学和史料学的范围。《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篇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

其归一揆。”这段话，也正是从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的区别和联系上来论述史才和直笔之间的关系。关于史学方法上的问题，应由史学史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在这里只着重指出刘知几论点之理性主义的倾向及其对史学优良传统的发展。

刘知几的史才论。《旧唐书》本传和《唐会要》卷六十三所记，颇为人所熟知，而本传所记比较详细。本传说：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榱桷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亘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旧唐书》卷一〇二）

这是以才、学、识三者为史才所必须兼备的条件，其说是自《孟子》开其端绪。《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后来班固作《汉书·司马迁传赞》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范晔为班固作传，称“固文赡而事详”，“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范晔自序《后汉书》，说“常耻作文士”，“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刘知几所说的才，相当于孟子、班固、范晔所谓的“文”。《史通》卷九有《核才》篇，就是专论史传之文的。刘知几所说的学，相当于孟子、班固、范晔所谓的“事”，是指史事说的。刘知几所说的识，相当于孟子所谓的“义”，班固所谓的